

上海电影 海外传播史研究

1923-2014

■ 徐文明 著



新上海
女
路天使
壮志
假凤虚
江春水向东流 渔光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 鸡毛信 聂
红旗
神笔马良 小蝌蚪找妈妈 小鲤鱼跳龙
城南旧事 桂林山水 老兵新传 阿Q正
英雄

上海电影

海外传播史研究

1923-2014

■ 徐文明 著

C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8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电影海外传播史研究：1923—2014 / 徐文明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 6
ISBN 978-7-106-04952-2

I. ①上… II. ①徐… III. ①电影—传播—电影史—
研究—上海—1923-2014 IV. ①J9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0375号

上海电影海外传播史研究1923—2014

徐文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100013
电话：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40毫米 1/16

印张/21 插页/2 字数/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952-2/J·2049

定 价 55.00元

目录

绪 论 / 1

| 上 篇 |

探索与开拓的历程：早期上海电影海外传播

1923—1949

第一章 市场探索与文化传播：20世纪20年代上海电影海外传播 / 5

第二章 助推抗战与多元拓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海外传播 / 57

| 中 篇 |

社会主义电影文化的海外交响：上海电影的海外传播

1949—1977

第三章 与国同行：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与上海电影的海外传播 / 108

第四章 百花齐放：上海戏曲电影的多样化发展及海外传播 / 118

第五章 主流视野：上海出品故事电影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 142

第六章 科学使者：上海出品纪录电影与科教电影的海外传播 / 166

第七章 民族风格：上海出品美术电影、舞剧电影的海外传播 / 174

| 下 篇 |

多元风貌与多向度传播：新时期以来上海电影的海外传播

1978—2014

第八章 多向并进：1978—1990年上海故事电影的海外传播 / 191

第九章 佳作纷呈：1978—1990年上海制作美术电影与科教电影的海外传播 / 231

第十章 变革求索：1990—2014年上海故事电影的海外传播 / 247

第十一章 砥砺前行：1990—2014年上海美术电影与纪录电影的海外传播 / 278

结 语 / 286

参考文献 / 291

附录一 上海电影海外电影节获奖一览表 / 297

附录二 上海电影海外传播代表性文献 / 312

后 记 / 329

绪论

上海，是一座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这座近代以来中国最摩登、最开放的都市，以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在中国最早接纳了电影的来临。早在1897年，电影便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并融入这座城市文化血脉。在时代风云际会中，上海成为中国早期最重要的电影放映市场，也占据了中国电影制片的中心地位。从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上海影人以饱满的探索热情、多样的创作手法和强烈的人文情怀，为观众奉献了《孤儿救祖记》《西厢记》《盘丝洞》《火烧红莲寺》《渔光曲》《天伦》《壮志凌云》《木兰从军》《假凤虚凰》《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太太万岁》《小城之春》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优秀影片。这些诞生在上海的影片记录了时代的影像，镌刻了海派文化的特色印记，传播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书写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华彩篇章。

早期中国电影和上海的不解之缘，使上海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绝大部分早期电影均由上海电影公司出品，上海电影几乎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代名词。上海出品影片不仅受到国内观众的欢迎，还成功地走出国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传播，扩展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电影融入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洪流。1949年到1966年，上海新老电影人薪火传承，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电影文化建设。在国家统筹规划下，上海电影占据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半壁江山。上海电影界百花齐放，不仅故事片、美术片、科教片、动画片片种齐全，而且影

片创作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此时，上海出品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鸡毛信》《女篮5号》《老兵新传》《小蝌蚪找妈妈》《桂林山水》《大闹天宫》等影片为中国电影史书写了诸多“第一”，展示了中国文化和新中国电影的魅力，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得到海外电影观众的由衷喜爱。

“文革”结束后，上海电影在新时期续写辉煌。上海电影人厚积薄发，传承上海电影发展的优良传统，锐意创新，勇于直面中国社会现实，呈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人文。80年代以来，上海电影人推出《天云山传奇》《喜盈门》《城南旧事》《阿Q正传》《燕归来》《芙蓉镇》《人·鬼·情》《留守女士》《三峡好人》《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鹬蚌相争》《山水情》等大量优秀影片。上海电影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主力军，上海电影人登上柏林、威尼斯、马尼拉、卡罗维·发利、开罗等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为中国电影争得殊荣。一批经典上海电影多次参加海外举行的各类影展，扩大了中国电影的影响力。

美国电影导演和评论家达利·纳尔把电影称为“铁盒里的大使”。回首上海电影发展过程，上海电影出色地担当了上海城市名片、国家文化大使的作用，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一部上海电影的发展史，既是上海电影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创新史，也是上海电影人以开放精神，勇于开疆辟土，积极开拓电影海外传播空间的传播发展史。本书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上海制作、出品电影的海外传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1923年上海电影的海外传播开始，按照时间脉络，分1923—1949年、1949—1977年、1978—2014年三个主要阶段时期，探讨上海电影自1923年海外传播起步至2014年迎来新的发展契机¹为止的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历程，总结上海电影海外传播的特色、推进路径、历史经验等内容，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上海电影的发展。同时，因上海电影在中国电影、华语电影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亦可提供我们认识中国电影、华语电影发展的一个独特视角与维度，对今后推进中国电影与华语电影海外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1 2014年10月24日上海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上海电影迎来新的契机。

上 篇

探索与开拓的历程：
早期上海电影海外传播

上海电影的大规模海外传播，真正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初。此时，上海电影成功打开了南洋市场，以上海电影为主体的中国电影风靡南洋群岛，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热情支持。上海电影公司与南洋片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南洋元素广泛渗入上海电影的创作与发展。与此同时，上海电影人没有放弃在北美、欧洲和日本开拓传播空间的努力。《西厢记》《盘丝洞》等一批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优秀影片传播至欧美地区。30年代以来，上海电影界继续海外传播的探索步伐，上海制作的影片在南洋、欧美等地放映，市场放映空间不断扩大。抗战爆发后，上海制作的抗战电影在海外放映，产生广泛影响。上海制作的影片为中国电影不断实现突破，首开中国电影国际影展获奖先河。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人继续电影海外传播的求索，《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在海外产生重要影响。从20年代初到1949年，上海电影在各个阶段，薪火传承，共同完成了电影海外传播的不凡探索历程。



第一章

市场探索与文化传播：20 世纪 20 年代 上海电影海外传播

上海和电影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1897年。1897年5月，美国电影放映商携爱迪生影片公司出品的短片来到上海，在位于虹口的礼查饭店进行了电影在中国的首次放映。此后，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电影纷纷“走进来”，在上海的银幕上展现世界的万千风情。上海的观众也热情接纳了电影的来临，观看影片很快融入了上海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外国电影在上海的成功传播，充分展现了电影的国际化传播特质和跨文化传播可能。

除热情接纳国外影片外，上海还逐渐成为早期中国电影制片的中心。1905年，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20世纪10年代，中国电影制作中心逐渐转移到上海。上海取代北京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制片中心并非偶然。上海虽非皇城，但早在1843年即已开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化都市。这里中西杂陈，华洋共处，资本雄厚，交通便利，市民思想开放，文化消费能力旺盛，所有这些都为影业发展和影片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

20世纪初,恩里科·劳罗、本杰明·布拉斯基等一些外籍影人在上海从事电影制作。到20世纪10年代,张石川、郑正秋等中国电影人以及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等机构开始制作故事短片、纪录片和新闻片。此时,上海影业尚处于探索阶段,影片制作水准、创意能力等方面明显不足,因此这些影片未能产生广泛影响。20世纪20年代,随着上海电影业发展,特别是《孤儿救母记》《空谷兰》《火烧红莲寺》等影片接连获得商业成功,上海电影业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期。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全国共开设175家电影公司,而上海就有141家。以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明星影片公司、上海影戏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等为代表的大中型制片公司及一些小型公司,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在伦理片、武侠片、言情片、侦探片、喜剧片、古装片等类型电影生产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上海的影片产量也逐年上升。据1939年出版的《国片年谱》记载,上海电影公司1924年出品影片16部,1925年出品影片数量达到59部,1926年出品影片数量上升到86部,到1929年则越过百部大关,达111部。¹这些影片既有展现上海都市现代生活的时尚元素,也有立足中国传统伦理的文化表达。上海不仅占据中国电影制作核心区域位置,而且上海电影还成功走向国门,影响力远及南洋、欧美等地。特别是在南洋地区,上海电影深受欢迎。上海电影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了中国电影生产的主体,上海电影几乎成为中国电影的代名词。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上海电影在南洋的传播

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南洋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和市场概念。20世纪20年代,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暹罗)、

1 《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总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马来亚、新加坡、越南（安南）、缅甸等地（即统称的“南洋”），成为上海电影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一、华人文化、华人群体、影片流通：上海电影和南洋的关系建构发轫

上海电影与南洋的结缘，早在20世纪10年代便已开始。当时，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商务印书馆制作的短片曾在南洋进行过小规模放映。20年代初，上海电影迎来发展的新阶段，《孤儿救祖记》等一批优质故事片获得广泛关注与市场佳绩，为艰难探索的中国影业注入了强心剂，也为上海电影在南洋的广泛传播带来新契机。

在上海电影获得快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中，南洋和上海电影之间建立起了时代性和文化上的密切关联。20世纪20年代，南洋仍处于被殖民统治时期，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成为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对象。伴随着殖民统治，电影这一新兴的文化传播媒介被引入到南洋。到20年代中叶，南洋观众对电影已经不再陌生。有了这样的电影文化基础，以上海电影为主体的中国电影向南洋的传播，无疑少了些许障碍。而更重要的是，南洋拥有数量庞大的华人华侨群体。早在明清时期，为谋求生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就有大批中国人“下南洋”打拼，经过数代的发展和积累，到20世纪20年代，南洋拥有了数以百万计的华侨。南洋华侨群体普遍吃苦耐劳，在当地拥有不俗的经济实力。广大华侨虽然身处异乡，然而中国文化的血脉并未在他们的身上中断，他们人在异乡，心系祖国，内心深处渴望能够了解祖国的信息，传承祖国的文化，一解思乡之苦。20年代，当电影在南洋开始普及，观众逐渐接受这种新兴的文化传播和娱乐形式后，上海电影也顺应时代需求，远涉重洋来到了南洋。

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出品的影片《清虚梦》《孝妇羹》《莲花落》和《荒山得金》被运往南洋，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菲律宾几个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1923年出品的影片《莲花落》，讲述了一个青年迷途知返的故事，该片是最早进入南洋市场的上海电影之一

朋友，正在准备经营这新兴事业……不久美属便有商务印书馆出品的《莲花落》及《荒山得金》放映。那时美属华侨，真的像梦里惊醒，大声怪叫‘中国也有影片了吗’的稀罕！同时，为了群众有种好奇心，这些国产影片的成绩，当然也就大有可观。”¹结果，《莲花落》及《荒山得金》在马尼拉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

获得了可观的票房：“连续七夜，竟座位皆满，盖侨胞争欲一新眼界，且戏中情节深合华人习惯，较易引起兴味，计所收约万余金。”²“当时在华侨的眼里，睹此有头有尾，有曲有折，表演动作不大背谬的影片，真是欢迎赞善，几把他端到云里，甚至对外人也要夸讲吾们中国居然能够出这种影片，荣幸啊！至营业的状况，那个买片的也差不多成为小富翁。”³

《莲花落》和《荒山得金》在菲律宾获得成功，其中固然有华侨首次观看国产电影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影片制作方商务印书馆一贯的高品质文化追求。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图书印刷出版企业，该馆1917年开始从事影业。在从影之初，商务印书馆便将辅助社会教育，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放在重要地位。1919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在呈请北洋政府农商部的“为自制活动影片请准免税”呈文中就明确提出，商务印书馆制作的影片要“分运各省各城商埠，择地开演，借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

1 苏秋生：《国产电影在南洋》，《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1930）。

2 佚名：《菲律宾通信：祖国影戏事业之佳兆》，《申报》1924年4月29日。

3 王宣化：《谈中国影业》，福建省泉州侨乡开发协会编、黄夏莹主编：《王宣化纪念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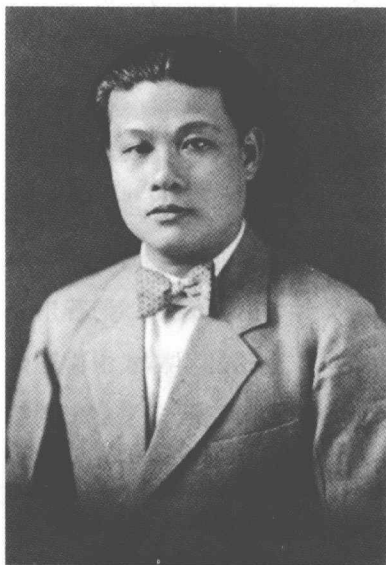
俗教育之助，一面运售外国，表彰吾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兼动华侨内向之情。”¹

正如商务印书馆免税呈文所言，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最初制作的几部长故事片皆重视影片的社会教育性，着力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这种文化精神在《荒山得金》和《莲花落》上皆有明显体现。《荒山得金》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影片在传奇故事的叙述中凸显落难男子金郎和船家女宜春真挚的爱情，歌颂了人间情义的可贵。《莲花落》一片改编自传统戏曲《郑元和落难唱道情》，采用时装片形式，讲述赴上海求学的郑元和沉迷青楼、落魄乞讨，最终得到情人拯救，迷途知返的故事。《荒山得金》《莲花落》是中国最早一批长故事片，影片剧情跌宕起伏，聚焦青年男女情感，热情歌颂正直善良、情义忠贞等可贵品质。如此深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片受到菲律宾华侨的欢迎，印证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的强大凝聚力与感召力，为上海电影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上海电影进一步进入南洋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1924年，上海电影在新加坡也打开局面，一批上海电影进入新加坡电影市场。该年5月，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出品的影片《大义灭亲》由上海汇源公司引进新加坡，在二马路中华影戏院上映。此后，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孤儿救祖记》等影片接连在新加坡放映。其中，《孤儿救祖记》在上海电影进入南洋市场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王汉伦、郑小秋、郑鹧鸪等人主演。影片采取家庭伦理剧样式，讲述余蔚如嫁给富翁杨寿昌之子，在丈夫意外身亡后，余蔚如被觊觎杨家财产的恶徒陷害，被杨寿昌逐出家门。此后余蔚如产下遗腹子余璞，并含辛茹苦将其抚养长大，少年余璞聪明懂礼，入杨寿昌所办学校读书，当年陷害余蔚如的恶徒又试图谋害杨寿昌，余璞发现后勇救杨寿昌，祖孙相认，余蔚如当年冤情得以昭雪，一家人最终欢聚。《孤儿救祖记》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家庭伦理题材影片，影片带有某种苦情戏的成分，传递了善恶有报、亲伦有序的传统

1 《商务印书馆为自制活动影片请准免税呈文》，《商务印书馆通讯录》1919年5月号。

价值观，其大团圆结局也颇符合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趣味。《孤儿救祖记》在上海首映后，影片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中国家庭伦理道德的强调和弘扬，极大满足了中国观众的道德观念和审美需求。影片在中国国内获得广泛好评，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市场成功。颇为巧合且让人回味的是，《孤儿救祖记》制作完毕在上海试映时，恰有菲律宾华侨在上海观看了影片试映，极为认同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他们在影片试映后随即提出购买南洋版权的要求。当时经办影片版权购买事宜的桂华山先生曾如是回忆：“第一次到上海时，下榻于锦发行，伍泽民先生处，伍先生设盛宴洗尘。酬酢之后，盛洁甫兄邀我往观明星电影公司出品《孤儿救祖记》之试映，因而得以认识张石川、郑正秋两先生。片中本事叙述一孤儿发挥孝思，表现勇敢，演出生动诚挚感动。观后我觉得电影这一门新兴事业，对于社会之进步，必能有所



桂华山曾任菲律宾中华商会主席，致力于推动上海电影在南洋的传播

贡献，也不难获取合法利润。遂与明星公司商谈，购得《孤》片在东南亚各地的放映权。我带去影片拷贝两套。后来事实表现，竟出乎吾人预计之外，《孤》片在星洲、马来亚、印尼各地上映，连场满座，获利甚丰，影片映期，一再延长，可见好的电影片，不愁不叫座。后来我又购得《玉梨魂》一片在南洋之放映权。”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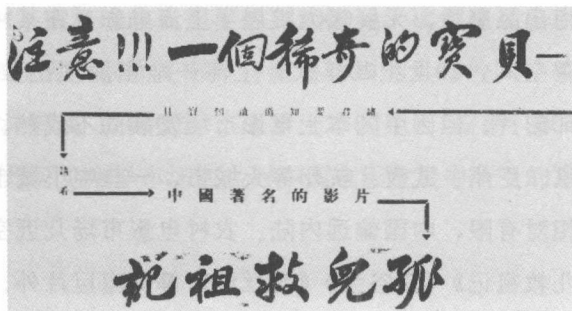
《孤儿救祖记》等片在南洋获得的巨大市场成功，印证了桂华山等人的判断，坚定了他们从事影业的决心，促成桂华山等人在南洋成立南洋影片公司。1924年，桂华山联合上海文化界人士盛洁甫、伍泽民等在菲律宾成立南洋影片公司，邀请长

1 桂华山：《在菲律宾参加侨团活动》，福建省晋江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晋江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版，第43页。

期在南洋从事文化事业的王雨亭负责新加坡市场，并在缅甸等地设置分支机构，“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签定协议，相互代理彼此出品影片之放映权”¹。南洋影片公司成立后从上海引进了大批国产电影，上海电影获得在南洋区域稳定的传播渠道和发展空间。



《孤儿救祖记》剧照



《孤儿救祖记》在新加坡发布的宣传广告

最初将《莲花落》《荒山得金》《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等片引入南洋的开拓者们可谓慧眼识珠，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电影这一新兴文化媒介的发展潜力，他们选择的影片或取材于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或以家庭伦理为核心，情节跌宕起伏，情感真挚动人，颇多苦情元素，让人潸然泪下。影片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慈孝、坚忍、无私奉献等元素，具有积极的教化意义，符合中国观众寓教于乐的欣赏趣味，颇能引起珍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南洋华侨共鸣。共同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淀和共识，使上海电影和南洋观众之间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这种共同的文化基因和共识，也使上海电影能够超越地域限制，从上海来到万里之外的南洋，受到观众的喜爱。无论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还是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凡是有华侨的南洋国家，上海电影均广受欢迎。到20年代中期，观看上海出品的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南洋华侨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唯一的消遣

1 桂华山：《在菲律宾参加侨团活动》，福建省晋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晋江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版，第43页。

法，便是大看影剧，而尤其爱看中国影戏”¹。“栖身异域的人，对于祖国的感情最好，身既不能飞到中国，那看看中国的影戏，借着赏览中国的本地风光，也足以慰情而悦性的。”²随着上海影片在南洋的卖座，来自市场的丰厚回报，也成为推动上海电影和南洋建立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20年代中期起上海电影在南洋的广受欢迎，为上海电影公司开启了广阔天地。南洋引进上海出品影片，无疑极大扩展了上海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亦即中国电影）的生存空间。20世纪20年代，上海一地虽涌现出数十家电影公司，出品了数百部影片，但因中国本土电影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国内影院多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电影市场虽有发展，但规模相对有限，中国偏远内陆、农村电影市场几近空白。在这种情况下，除《孤儿救祖记》《空谷兰》《盘丝洞》等卖座巨片外，大多数影片仅靠本土市场尚无法保证盈利，而南洋市场的存在无疑给处于困境中的电影公司注入了强心剂。由于上海电影深受南洋观众欢迎和认同，上海电影公司无需支付太大发行成本，便可将南洋版权售出。而一旦南洋版权售出，等于获得一份净收益，来自中国本土市场和南洋市场的双重回报，极大降低了电影公司的制片风险。

对国内某些资本羸弱的小型电影公司来说，南洋市场堪称决定公司存亡的生死线。以友联影片公司为例，该公司创立初期拍摄的几部影片均差强人意，“《娼门之子》拍了六个月，却差点把公司搞垮了……到拍《儿女英雄》时，情况更糟。可是影片《儿女英雄》和观众见面后，大受欢迎，本来影戏院计划映五天，却映了半个月，南洋片商很满意，友联影片靠了这部片子，站住了脚跟”³。南洋市场的热烈反馈，给友联公司提供了影片制作的信心和资金保障，该公司此后拍摄了一系列武侠片，更将《儿女英雄》发展为一部长达5集的系列影片，在南洋市场获得持续成功，南洋市场对当时上海小型电影

1 观场：《新嘉坡归客谈》，《苏州中报》1927年10月1日。

2 观场：《新嘉坡归客谈》，《苏州中报》1927年10月1日。

3 范雪朋：《我的银幕生活的回忆》，《中国电影》1956年第11期。